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

文史资料选辑

（印章）

合订本 第三十二卷

希望过了 100 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，作为对社会的贡献……
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，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……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开国至今已经 10 年了，如果不抓紧，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……
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，反映新的情况，但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，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……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。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……暴露旧的东西，使后人知道老根子，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。周恩来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总第
93—95
辑

文史资料选辑

（市）

合订本 第三十二卷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



蒋介石1927年下野返浙点滴/003

◎ 章 培

蒋汪矛盾的一个侧面/007

——我参加国民党改组派活动的回忆

◎ 牟龙光

回忆我与蒋介石的几次接触/023

◎ 刘万春

蒋介石是怎样搞垮贵州军阀王家烈的/035

◎ 熊绍韩

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元及外币的经过/041

◎ 詹特芳

宋美龄与遗族学校/046

◎ 储子润

宋美龄——基督教——新生活运动/049

◎ 邓述堃

宋美龄飞迪记/053

◎ 胡彦云

戴季陶为何砸瓶子/056

◎ 周一志

电话中的宋美龄/058

◎ 王正元

回忆国民党政府对西藏政务的管理/060

◎ 孔庆宗

西藏插手西康大金白利纠纷的真相/068

◎ 孔庆宗

黄慕松入藏纪实/079

◎ 孔庆宗

俄罗斯帝国驻华宗教代表团在华史迹/092

◎ 赵德本

华北护教运动本末记/114

◎ 王孟扬

脱俗琐记/119

◎ 修 明

空门忆旧/125

◎ 仁喜

故宫博物院盗宝冤案之谜/128

◎ 余 盖

大革命洪流中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/141

◎ 黄琪翔

回忆张自忠将军/148

◎ 张宗衡

章太炎先生东京讲学琐记/190

◎ 任鸿隽

章太炎先生晚年在苏州讲学始末/192

◎ 任启圣

忆东南大学讲学时期的梁启超/197

◎ 黄伯易

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/206

◎ 周作人

科场回忆录/218

◎ 钟毓龙

科场续记/246

◎ 钟毓龙

《辞海》创刊的经过/254

◎ 金寒英

冤狱回忆/263

◎ 高秉坊

高秉坊“贪污案”内幕/277

◎ 杨 铎

高春如冤狱记书后/287

◎ 章士钊

北京梨园谈往/288

◎ 讷 荃

关于《孽海花》的一些史料/299

◎ 万 武 徐养疾

质疑·补充·订正

对《我所知道的陈独秀》的订正两则/303

◎ 李永璞 陈长松

对《蒋介石下野回溪口的见闻》的订正和质疑/305

◎ 陈瑞麒

杨虎城出国前及在国外日记/309

◎ 张协和供稿

我在北大/329

◎ 千家驹

回忆宋庆龄在救国会时期二三事/351

◎ 胡子婴

旅德华侨抗日救亡运动/354

◎ 秦丰川

阎锡山的早年历史/365

◎ 张瑞生

阎锡山的军阀生活/378

◎ 李蓼源

抗战初期日寇对阎锡山的诱降活动/389

◎ 曲宪南

晏阳初与平民教育/396

◎ 晏升东 孙怒潮

刘仲秋与夏声戏剧学校/409

◎ 柳若痴

唐人（严庆澍）在台北/423

◎ 陶鹰 顾忿

解放前西昌彝族社会的奴隶制度/428

◎ 陈汝聪

旧社会吸毒、贩毒琐记/440

◎ 张文钧口述 李宜琛整理

旧社会拐卖人口的见闻/446

◎ 白恩育口述 王子威整理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编

文史资料选辑

第九十三辑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蒋介石1927年下野返浙点滴

◎ 章 培

1927年8月，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，指挥徐州战役（当时孙传芳取得张宗昌支持，又卷土重来），结果失利而“下野”，人所周知，但详细经过，却鲜见记述。我曾随北伐军东路军经赣、浙入沪，对蒋介石、白崇禧之间的矛盾，有所了解，当蒋下野后，其侍卫长王世和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，与我同驻宁绍地区，常有往来；后至1943年，王世和参加陆大学习，我适在陆大执教，茶余饭后，常谈及往事。兹就所知，追述于下。

一、白、李、何“逼宫”

徐州战役，蒋介石失利，对北伐军造成损失较大。在南京总司令部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，蒋介石先发言，谓检讨此次徐州战役失利，主因在黔军王天培军不听指挥，贻误戎机，致遭失败，言下不胜悻悻。接着白崇禧发言：“总司令太辛苦了，应当休息休息，让我们试试看吧！”李宗仁接着表示同意白的意见。何应钦默不言语。会议不欢而散。

会后，蒋独自在房里踱来踱去，约半小时后，对王世和说：“你打电话请敬之（何应钦）来！”何接电话后赶到，蒋亲切地问他：“敬之，你对白健生（崇禧）的提议以为如何？”何说：“在当前形势之下，我也只能同意他们的建议。”言毕，何就返身告辞。蒋深为失望，盛怒之下，命王世和叫警卫师师长姚琮来见他。姚来后，蒋命姚从速集合全师，跟他回浙江。姚说：“我的师已经分散，集合不起来。”蒋更怒不可遏，把姚琮骂走后，又对王世和说：“你赶快集合全团跟我走！”王外出集合队伍，但其中邹公瓚一个营，也听命于何应钦而不愿走。王只剩下两个营，而且搞不到交通工具。蒋无奈，只带一个秘书、两个卫士回奉化老家去了，命



王世和率队随后步行赴浙。

据事后王世和告诉我，当时蒋一直认为何应钦与他都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，而且是黄埔的老帮手，当时只要何与蒋一心，掌握黄埔军还是没有问题的。因此，只要何应钦支持他，事尚可为。

二、周凤岐“逐客”

当时浙江省主席兼二十六军军长周凤岐，本来是跟孙传芳到江西阻挡北伐军的；但在夏超失败之后，他虽回浙，也不容于卢香亭，被逼而投靠白崇禧。在白所指挥的三大战役中，颇能振奋立功，尤其在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中，他是代替白崇禧屠杀共产党人而回浙江兼任省主席的。

浙江省防军指挥官蒋伯诚，原来是北伐军第一军的参谋长，蒋介石以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，何应钦是代理第一军军长。

蒋伯诚想带兵，到浙江任省防军指挥官，知道我是夏超部下的统带，就邀我当他的省防军第六团团长，担任宁波、绍兴十四县的治安，这是1927年上半年的事。

当年8月10日，我接到蒋伯诚急电，要我即刻赴沪，有要事面商。11日晨抵沪，蒋伯诚见到我就说：“你来得很好，但有人说你倒向白崇禧了。总司令回奉化，想不到周凤岐这个坏蛋，派了一个秘书，带5万元送总司令，且要他赶快离浙，以免他办事为难。总司令气极，命我派兵扼守钱塘江，本月15日起，将浙东税收，一律截留充饷，并给我300黄埔学生，要我组军守江。我在宁绍只有你这一团主力，你看怎么办？”我说：

“我团是驻防部队，分驻十四县，有固定任务，充其量只能集结一个营。周凤岐有一个军，以一个营守钱塘江沿岸，以御一个军的进攻，无异暴虎冯河，我是不干的，难道区区一个周凤岐，您就没有办法了吗？”蒋伯诚问计，我说：“您去见何应钦，就说总司令本是第一军军长，现在下野回老家都不行，您、我当代军长、参谋长的颜面何在？您此去一方面向他汇报总司令回浙的实际情况，顺便摸摸底，到底周凤岐这一手是自己搞的，还是另有渊源？”

蒋伯诚一听言之有理，当夜赶赴南京，见了何应钦，何说：“周凤岐是白健生安排在浙江的，应请健生来解决。”当即电话告白崇禧。白到，听了蒋伯诚的汇报，大骂周凤岐胡闹。最后决定将周凤岐撤职，以总司令部参谋处长陈卓接二十六军军长；由何应钦兼任浙江省主席，而以浙江省防军指挥官蒋伯诚兼代。

蒋伯诚这下来了个两面光，自己也捞到个代理省主席，好不高兴。回沪后真有点忘形，连称我是他的“诸葛亮”，即命我偕他赴宁波。抵甬，

立即以省主席名义召集开会，到会的有宁波警察局长蒋鼎文、我和我团第一营营长蒋伯雄。会议决定：命蒋伯雄率所部到奉化严密警戒，保护总司令安全，并要我代表他每周去伺候总司令一次。我当时考虑到团里有不少共产党人，我三弟秋阳化名章乃起任团军需主任，我害怕经常离开会出意外；另一方面我也有自知之明，这位总司令我是难伺候的，我是干不好也干不了。我沉思了一会，正拟托词，蒋鼎文插进来说：“章团长负担十四县治安，责任不轻，恐难离开；我只要将局事托交张剑吾督察长兼代，可以专心去伺候总司令了。”我闻之，乐得顺水推舟，这个差事，就让他去顶了。

三、侍卫队抢劫余姚银行

过几天，王世和带两营侍卫队步行到达百官^①，状况十分狼狈，大有“草木皆兵”之势。王到团部和我商量，要求暂住团部，以避白崇禧的追击，并知我与白是保定军校三期同学，要我照拂一下。我因上述种种原因，不愿意他驻在我团部或附近。我说：“这里地形我比你熟悉，我扼守曹娥江，保护你的部队乘火车到宁波，保护总司令。否则，你怎么称是侍卫长呢？又侍卫谁呢？”他一听，正合他心意。他是怕我不让他走，故意这样探探我的口气的。当即给他们吃过饭，联系好火车，上路。谁知车过余姚时，就有两个连一定要下车，将余姚中国银行劫掠一空，带枪拉上四明山当土匪去了。原来这两连中多数人本来就是四明山土匪出身，真所谓兵匪一家了。我曾为此电告蒋伯诚，他回电要我严守秘密，以免有碍听闻。他另派人去处理银行被劫事，而这两连人仍入山为匪，在治安上给我增添不少困难。

不久，蒋介石赴日本，王世和借总司令部侍卫长名义，在宁波简直闹得像个土皇帝，娶了军装店的女儿陈佩玉做老婆。结婚之日，门前张灯结彩，真是车水马龙，贺客盈门。我当然也是贺客之一。后来，蒋介石从日本回来，宁波同乡，群起告了王世和一状。结果王被蒋介石拳打脚踢，揍了一顿，以平众愤。

四、绍兴遭池鱼之殃

蒋介石下野这幕丑剧，是国民党内部倾轧、矛盾的结果。但是，蒋介石早就有意改变第一军为浙江籍，以便作为他个人的本钱。所以在浙江搞

^① 百官，镇名。在浙江省东北部、曹娥江沿岸、萧甬铁路上。



了十个总司令部的补充团。其补充第二团及第六团，就在我的辖区：第二补充团驻五夫营房，团长萧健是黄埔第一期毕业的，知道蒋介石下野后，整个团就自动解散了。第六补充团驻绍兴城内，团长刘保定，黄埔一期毕业，他到绍兴不久，就娶了参议院议长王家襄的女儿，知蒋下野后，以军饷无着为名，向绍兴商会借到10万元，带着新婚的老婆走了。其部下的营连长，也要了5万元，并缴了绍兴县公安局700支枪，但缺乏子弹，知道我团子弹很多，只有一个特务连在身边，决定要来偷袭。幸而绍兴人对我有好感，设法利用铁路的电话，报告我团。我侦知情况确实后，即对团部及分驻在嵊县、新昌、上虞三县官兵作紧急部署，并电告蒋伯诚。蒋伯诚也认识到绍兴人是不可侮的，即回电要我对叛兵格杀勿论。当叛兵进袭百官我团部时，被我迎头痛击后，即向嵊、新、上三县逃窜，被我团先后缴枪700余支，俘人近1000人，只在曹娥江畔毙了两个持枪抢劫的士兵。在三界捉到一名黄埔四期生，他持手枪抢劫商铺，被逮住以后，我团中校团附杨步飞，系黄埔一期毕业，要求保释，因三界系三县交界地区，司法权在三县，经三县会审后，结果仍被枪决了事。蒋介石第一次下野，仅在我所知的宁绍地区，其扰民害民，殃及人民群众的事件，即有上述之多。

五、替死鬼王天培

北伐军自从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，实已失去其所谓国民革命军固有的本质。嗣后徐州之役，实质上也就是新旧军阀之战。蒋为了推卸失利的责任，嫁祸于王天培。

何应钦在贵州与王天培同时当旅长，向来不和，到1920年何被逐出贵州，王天培也是逐何的干将，现在何应钦既是南京军事委员会三巨头之一，又兼浙江省主席，王天培的命运就很危险了。

我团少校团附童厥初，原任浙江省防军副官处科长，他就是奉命去执行王天培死刑的见证人。据童告诉我：王天培解职后，原来是要他到杭州西湖休养的，接着何应钦就派专人送来军委要枪决王天培的命令。王天培很迷信，临刑还拿出一颗保命的“舍利子”（佛骨）。

何应钦此举既报了私仇，又可讨好蒋介石，为以后共事留余地。

蒋汪矛盾的一个侧面

——我参加国民党改组派活动的回忆

◎ 牟龙光

前 言

1929年春，我在中央军校第六期将毕业时，曾参加了国民党改组派。不久，我由中央军校毕业。适蒋介石令首都卫戍司令谷正伦在卫戍司令部设立“政治警察训练班”，延请德国顾问闻德、克勒托拿等人为蒋训练政治特务。蒋介石当时是军校校长，他来点名时，在我的名字头上划了一个红圈，指定我报考该训练班受训。与我一道入该班的计60多人，都是军校六期毕业的学生。改组派当时也希望我进入这个班，将来在蒋的政治特务中作特务中的特务（以后这个班的许多人都进入了军统）。我入该班后约两月，军校放了暑假，这时由于改组派在军校的领导人、军事教官罗翹秀粗心大意，疏于检点，致使加入改组派的军校同学60多人的名册被一个江西同学盗走向蒋介石告密。组织泄露了，我于同年8月初逃出该班，与30多名参加改组派的同学相约赴沪，到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三百一十四号报到。报到后由朱霁青委员指定焦斐瞻安排我们的食宿，住在马浪路京都公寓，由改组派组织负责我们的生活费用。以后曾在上海、香港、广西梧州、江苏、贵州东部、北京、太原等地作过反蒋军事活动。

蒋介石的南京国民党，与汪精卫的改组派之间的斗争，是各帝国主义争夺中国市场的角斗的一个反映。与此相配合，国民党新军阀之间也爆发了一系列争夺地盘的战争。总计从1927年到1930年的三年间，大规模的军阀战争即有六七次之多，战祸遍及大半个中国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，也使中国的经济、文化等各方面遭到了难以估量的损失。

现将我所了解的这一时期蒋、汪矛盾的一个侧面分述如下，由于事隔半个多世纪，挂一漏万或错讹之处在所难免，恳乞读者不吝指教。



一、我加入改组派的时代背景

从1924年到1927年，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，孙中山先生提出了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的三大政策，改组国民党，实现国共两党合作，创建由共产党参加领导的黄埔军官学校，组织国民革命军，于1926年7月上旬从广东出师北伐，以雷霆万钧之力，相继击溃了盘踞于长江沿岸的北洋军阀吴佩孚的主力，挫败了号称浙、闽、皖、苏、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实力。全国人民咸以为中国将由分裂转化为统一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将付诸实现，全国各界青年纷纷奔赴广州、武汉、南京，投入革命阵营者数以万计。我个人也是投入这股革命洪流中的一员——1925年，我离开贵州，考入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。

但是，正当革命势力迅速向长江、黄河流域发展时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，积极准备破坏革命。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，蒋介石、汪精卫先后在上海、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，上海、长沙、武汉等地，无数共产党员、革命青年和工农群众，惨遭新军阀的血腥屠杀。1927年8月，蒋介石曾一度辞职赴沪，以威迫武汉方面的国民党员赴南京。9月17日，南京国民政府改组，宁汉两派合流。12月10日，蒋介石复任总司令，翌年1月通电复职。蒋重新上台后，处心积虑地把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和党务大权抓在自己及亲信手中。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紧张策划，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决定于1929年春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，通过“施政方针”，使其攫取的权力披上合法的外衣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，他们用指派、圈定的办法，产生出席三大的代表，把在广东召开的第二届委员会选出的执行监察委员，即所谓“粤方委员”，包括许多头面人物，诸如汪精卫、陈公博、顾孟余、王乐平、王法勤、朱霁青等人，一概排除在外。当时在国民党内，对蒋介石的这些做法，持反对态度者，为数是不不少的。

这时，汪精卫在法国；在国内的陈公博、顾孟余、王乐平、王法勤、朱霁青以及相当一部分“粤方委员”，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改组国民党的主张，遂在上海组成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（简称改组派），下设行动部、地方干部委员会、军事委员会、宣传部等，并在上海办有一个刊物，名《革命评论》。在刊物上，主要是为汪精卫、陈公博、顾孟余等人出席三大制造舆论。记得大意是汪、陈、顾等粤方委员，是出席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当然代表；而“西山会议派”为邹鲁、谢持、林森、居正、张继、李石曾、胡汉民等，则是反对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大政策而被开除出党的，故不能出席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。其次，刊物还就“中国国民党代表